

第二辑

1982

苏联东欧国家在计划工作
方面的一些改革和变化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

罗马尼亚当前经济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

南斯拉夫经济建设的成
就、困难及其原因

稳步发展的保加利亚经济

波兰八十年代初期经济状
况的一般特点和原因

布鲁斯及其社会主义经济
模式的理论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第二辑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编辑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尹凤阁

主 编 赵 洵
副主编 贾连义 王德一
编 委 张达楠 陆南泉 张文武 韩 维
李静杰 胡毓鼎 张 震 孙维熙
方荣萱 陈德兴 蒋妙瑞 乔增锐
丛 林

中 国 苏 联 东 欧 学 会 主 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编辑部 编辑
北京地安门东大街 8 号或北京市 1103 信箱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第 二 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345,000 字

1982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3002·240 定价 1.2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苏 联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法]罗歇·加罗蒂 1

苏联是一种“畸形的”社会主义社会[英]菲利普·科里坎等 15

发达社会主义概念的形成及其内容[苏]阿·帕·布坚科 19

民主集中制：集权与分权(讨论。续)

 经济机制的完善和劳动法的某些问题[苏]P·З·利弗希茨 30

 部门体系及其管理中心[苏]Ю·В·苏博茨基 37

利润在苏联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厉斌 张红 43

苏联对外贸易理论的若干问题[苏]瓦加诺夫、佛鲁姆金 54

苏联的外贸政策[美]马歇尔·戈德曼 59

苏联与西欧共产主义[美]罗伯特·莱格沃尔德 65

东 欧

东欧的政治结构[英]乔治·肖夫林 76

罗马尼亚当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刘开铭 83

南斯拉夫经济建设的成就、困难及其原因徐坤明 夏士华 92

社会主义自治与技术统治势力黄良平 丁文琪编 109

一种值得注意的人民代表制

 ——介绍匈牙利人民代表制肖 石 121

稳步发展的保加利亚经济曹 英 131

农业生产效益和科学技术进步[保]茨·鲍日科夫 143

波兰八十年代初期经济状况的一般特点和原因 149

哥穆尔卡执政的十四年(1956—1970)[波]杰瓦诺夫斯基 163

华约组织中的波兰军队和波兰军官[波]米·切辛斯基 173

资料

集体化运动中党的一次重要会议

——记联共(布)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央全会[日]溪内谦 182

赫鲁晓夫时期农业上的几个问题 190

当今苏联的民族问题

——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报告选编 195

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捷尔

任斯基[苏]H·瓦连廷诺夫 207

新书介绍

一个法国人眼中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

——《被窃取的权力》一书简介 华 奋 215

人物介绍

恩维尔·霍查与阿尔巴尼亚杨达洲编译 220

布鲁斯及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张文武 229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

〔法〕罗歇·加罗蒂^①

本文是《社会主义的急转弯》一书的第三章。文章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产生的历史过程,存在的问题,以及强制推行这种模式给苏联和国际共运造成的危害。作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中央集权的模式。苏联的出路何在呢?文章说,要么继续保留军事官僚集团,建立新拿破仑的反动统治和军事专政;要么恢复高度民主,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

要了解苏联领导人对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在制度发展方面引起的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必须回顾一下形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各种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当时最完善的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它所包含的矛盾。

几乎就在当时,对马克思的著作,出现了最早的教条主义解释。这就是考茨基的著作。他用实证主义的发展论来概括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只能在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产生,后者将自动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工人阶级只要组织起来和等待时机就行了。

当列宁在一个存在着严重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发展又比英国、法国乃至德国晚了一个多世纪的国家里毅然地引导工人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考茨基不肯“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②继续盲目地重弹老调,以其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为反革命势力张目,说什么只有在最发达的工业国才可能暴发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从这个公式出发宣称“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前提”,因此也就不值得在那里开展革命。

列宁以生动的、非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他进行了回击。也就是说,列宁不是从字面上去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如把一些在发现时对当时的历史起作用的法则运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而是掌握其精神实质,即马克思的学说是从具体的国家和具体的时代的特殊矛盾中找出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并付诸实现的学问。

“正统派分子”竭力效仿法国革命的典型榜样(先是经济上成熟,然后再进行政治革命),列宁则反对“正统派分子”这种片面的、机械的决定论,列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论证了这种顺序可能相反。他写道,革命者可能犯一种最糟糕的错误,那就是向后看,看以往的革命,尽管生活中不断出现许多新鲜事物。

^① 法共前政治局委员。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31页。

列宁回答考茨基的反对意见时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把这句话视若至宝。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道理，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评价俄国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标准。”列宁接着说：“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么样呢？……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①

十月革命断然证实了这种可能性。这样，就将资本主义制度打开了第一道缺口，并给资本主义提供了第一个具体的选择。

列宁在领导这场革命并引导它走向胜利的时候，从未陷入考茨基的教条主义错误，因为他充分了解到在这场革命中什么是俄罗斯所特有的，什么是偶然的。他总是详细地分辨在这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哪些东西具有普遍意义，哪些东西来源于旧的社会结构和历史。

在逐步深入研究列宁学说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指出过^②，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中根本得不出下述结论：

只有存在一个党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通过共产党来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以限制丧失了经济特权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为前提。

苏联出现这些情况，并不是由于原则思想的要求，而是一些历史原因造成的。如果把一些当作必须遵守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而奉为圣典，那便是以斯大林的思想偷换列宁的思想。

关于在存在多党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列宁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曾经写道：“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斗争并通过实践来考验他们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③仅仅由于历史原因（因为所有其它政党一个接着一个地投入反革命队伍的行列，并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合作），布尔什维克党才成为唯一能够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彻底胜利的党。

对限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权问题，列宁的态度也是十分明朗的，他说：“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应该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及其发展的特殊道路……预先就担保说，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④

列宁根本没想给共产党以代表工人阶级说话和代表工人阶级实行专政的特权。他甚至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因为他不仅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党的专政混为一谈，不仅没有为这个党要求国家权力的垄断权，而且认为，来自非党群众的监督对于防止官僚主义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33—434页。

② 罗·加罗蒂：《法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巴黎1968年版第113—124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50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36—237页。

产生是必要的。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写道,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并且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①

按列宁的思想,工会是使广大非党工人群众同共产党人聚集在一起的组织,工会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为防止苏维埃机关中产生官僚主义而进行斗争。

列宁在世最后几年中(即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为防止苏维埃国家产生官僚主义而进行斗争,就是同那种以党的机关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进行斗争。

一九二一年二月,列宁在给国家计委一位领导人的信中写道:“最大的危险就是把国家经济计划问题官僚主义化。这是莫大的危险。”^②

一九二二年三月,他又写了下面的话:“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的……共产党员。”^③

列宁清楚地看到,什么是实行民主和同官僚政治进行斗争的主要障碍。这种官僚政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来源于这种制度的本质,在俄国,一九一九年则来源于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列宁接着指出,国家文化水平低导致了党的机关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与此同时,他还给后来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那些东西下了一个预见性的定义:“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④

列宁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变态的客观原因。

一九二一年一月,列宁在回答布哈林的问题时说明了这场革命悲剧的实质:我们这里是工人国家,然而它的特点却是农民占多数,而不是工人占多数。

国内战争和外来干涉使战斗在各条战线最前列的优秀工人干部蒙受了牺牲,这就使上述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了。这样就不得不在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抉择是非常困难的: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落后状况,要么陷在这种落后状态中不能自拔。

列宁以非凡的天才和大无畏的勇气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但也清楚地意识到由此带来的风险。

任务的艰巨性在于:要实现原始积累(这种积累有时达到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就得在工人阶级仅仅象农民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岛一样的国家里建立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制度都无法建立的功绩。

人数不多的党的机关是唯一的“推动力”,因为在这条道路的头一阶段上要想叫人去作这种牺牲,当时还不可能“指望觉悟”。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7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73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96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56页。

以失败告终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带来的混乱,以及对白军的斗争,外国干涉和饥谨,这些不利情况合在一起,加重了由一九一七年俄国社会结构产生的这一主要困难。

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必须高度集中权力和严格军事纪律。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革命的成败,而且也关系到民族本身的生死存亡。

这并不是什么反常现象,然而,在革命形势高涨时期的这种高度集权丝毫也不能排斥实行民主,不是对权贵们实行民主,而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民主。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府使这些群众(也包括农民)摆脱了战乱和以往的奴隶地位,他们的革命热情得到了解放,人民与自己的领导者同心同德地生活、劳动和战斗。列宁十分关心用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来提高“群众热情”,因为群众的朝气蓬勃的创造积极性,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社会主义靠上级的命令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与政府方面的官僚主义的“自动化”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具有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对人民委员会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决议中的这些话作进一步解释时说:“实行工人监督制……我们当时想表明,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从下面来进行改造的道路,以便工人自己从下面来创立经济条件的新基础。……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事业的艰巨,但是我们断定说,只有信赖劳动群众的经验和天性,切实担负起这个任务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①

列宁意识到,必须不断鼓励和支持群众首创精神,以补偿在不可避免的集权化道路最初阶段产生的后果。必须抓住锁链的两头(上头的集权和下头的首创精神和自发性),这是克服困难的首要条件。这些困难与革命形势高涨、抵御资本主义的包围、经济和文化落后、物质贫乏以及干部不足都有关系。这些困难的产生是由于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运动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里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还必须解决同落后状况作斗争的问题。

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不十分发达的国家里,这在以后全部的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克服落后状况的绝对必要性使列宁的继承人混淆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斗争第一阶段的目标——积累。

在二十年代俄国的条件下要高速实现工业化就需要高度集中。而这种集中只有运用政治力量,才可能实现。在革命初期,这种政治力量是革命的热情,但是,十年之后,这种政治力量则变成暴力和镇压了。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它的建设条件,斯大林主义的悲剧就是对这个目的进行偷梁换柱。

马克思和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解放劳动力。正因为这样,列宁才如此担心制度的官僚主义化,并为发扬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而不倦地进行斗争。

斯大林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把一切都归结到它的一个方面,即加速发展生产力,并且为达到这个目的竭力扩大国家权力。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439页。

党和国家从此便开始蜕化,这是斯大林在他的《列宁主义问题》中一手导演的。

在党的问题上,斯大林把考茨基关于给工人阶级“从外部输入”意识的观点作为唯一的原则。一九〇二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也重复过这个观点。但这只是列宁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经历了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后,列宁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不再把革命斗争的“主观因素”仅仅归结于党。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列宁主义还有另一个决定性组成部分,即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

当革命仅仅指望“主观因素”,即指望“从外部”给工人阶级输入革命意识的党时,便发生了最初的变动:党取代阶级并以阶级的名义独揽一切。这样,党也就变成了机关,而机关大权又完全落到领导者手里。最后便由一个人来代替大家考虑和决定问题。

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情形同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不是为了解放出越来越大的社会动力,而是由党,进而由党的机关,最后则是由党的领导者们或者一个领导人攫取决定一切的垄断权,并盗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在没有工人阶级参与的情况下,决定一切问题,最后则是反对工人阶级。

由于目的变了,这个党及其机关则专门致力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经济管理。而且,他们又以高度集中的和指令性的经济计划观点作为出发点。这也背离了列宁关于“要发动群众真正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国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获得完全的胜利”^①的学说。

党变成国家机关,社会主义民主也开始蜕化。当国家所有制成为社会所有制的唯一形式时,当领导机关把整个经济视为不断增多的官僚们手中统一的大托拉斯时,当一切计划完全由上层制定时,各项决定也就不再由基层单位通过了,苏维埃也就不再是生气勃勃的、协商性的、有效的和按照巴黎公社榜样建立起来的机关了,它们召开会议完全是走过场,只不过为了听取和肯定上级的通知和决定。

随着群众革命热情的低落,制度的危害性也就逐渐暴露出来: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成员越来越少,脱离人民,脱离实际,陷入官僚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而不能自拔。这种社会管理形式同客观发展规律便发生了矛盾。理论本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象在马克思和列宁手里那样被当作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工具,而变成事后对领导人工作的辩护词和颂词。

从此以后,由于一切(从经济生产到文学艺术)都要受到党和国家的控制和监督,所以社会活动的各部门就按照斯大林的设想逐渐变成中央机关的工具或“传送带”。

这样的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是有效的。这不仅仅由于我们已经指出的原因,即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掩盖和弥补了制度的缺陷,同时还因为经济遭到战争和外来干涉的破坏而十分落后,所以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消费情况:产品质量低劣并不影响销售,大批量的产品,甚至是不配套的产品,照样也能被全部“吞掉”。

但是,到二十年代末,这种合理的经营形式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农民根本不愿实行集体化,他们陷入了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之中^②。工人没有动员起来积极参加管理,他们对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55页。

^② 在旧制度统治时代,即使收成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粮食也得出口;现在农民能吃饱肚子了,他们消耗的粮食比过去多得多,所以城市的粮食供应就很困难。

生产不感兴趣，他们以雇佣奴隶的态度，最好也不过象顺从的官吏一样，对待庞大的国家机器。

从此以后，这种制度要发挥自己的职能就越来越要依靠强制手段了。在一九二九年底到三十年代初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开始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采取种种镇压措施。

在苏联历史上，一九二九年这个转变同美国历史上一八九〇年的转变一样，在选择方针上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一九二九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阶段顺利地完成了。虽然战争和外来干涉造成了全面破坏的状态，可是到一九二五年底国家经济基本上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俄国的工业产量已占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列宁的电气化计划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到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各电力中心的发电量超过革命前的一倍半。在恢复时期的头五年内，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倍。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苏联政府发动了第一次国家工业化运动。这一时期，工业产值总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八。在此以前，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达到过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新的工人阶级形成了：一九二八年工人和职员人数接近一千一百万人。

扫盲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布了列宁关于在成年人中消灭文盲的指示之后，到一九二二年，已经有五百万成年人学会了读和写。到一九二四年底，大学生的数量从革命前的十一万二千各增加到十六万二千名。

如果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取得的成绩进行总结的话，那么可以说，十月革命十周年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具有战胜经济落后的能力和为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提供新条件的能力。

只有农业还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和国家需要的增长。

然而，新的跃进的先决条件已经成熟：一九二九年苏联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宏伟纲领。“突击手”运动给社会主义竞赛作出了榜样。它是一九一九年的“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继续。“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工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自愿参加劳动。列宁写道：“‘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①

如果这个运动，在列宁看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那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源和证明，它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的普遍联合结合起来”。^②

正是列宁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曾写道：“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劳动者和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③。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85页。

② 同上。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83页。

“必须反对……一切死板公式和想由上面规定一个统一办法的企图”^①。他在强调社会主义的绝对独特性时说：这是“强制劳动由自为劳动取而代之的这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②。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伟大精神概括成为一条毋庸置疑的定理，他说：“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③

可见，列宁再次提醒我们：在革命运动的“主观因素”中，群众的历史性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首创精神同觉悟因素和理论因素是不能分割的，而阐明理论因素则是党的任务。

正在革命形势高涨的紧张时刻，当“雅各宾”式的中央集权制仍然完全必要的时候，列宁又一次证实了这些原则。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转变恰恰证明了，人们忘记了列宁这个辩证法，忘记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与党所代表的理论的复杂关系，这样就形成了革命主观因素的两个极端。

将经济恢复引上正轨后，不去利用群众在建设表现出来的创造性首创精神这一强大社会主义促进因素，不为唤起这种首创精神创造条件，单靠继续加快速度来克服落后性，就不可能解决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新课题。

在这以前，中央集权制是必要的；而从这以后，只要依靠社会主义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即保证劳动人民真正参加制定有关企业和国家管理的各项决定，发扬人民的首创精神，就可以取代革命高潮时期的那种“雅各宾”式的集权制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背离了列宁主义关于组织形式必须适应不同情况的要求这一非常英明的原理，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后来便构成了“斯大林主义大宪章”。

当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恢复农业生产和实行集体化^④，另一个是实行工业化。

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采用了强制的办法和由上级发号施令的办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在农业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他对集体化的见解，而这种见解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集体化概念相对立的。他引证了恩格斯对“农民问题”的观点：“我们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生活得好些，使他们易于转到合作社，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做的话；如果他们还不能决定这样做，那我们就设法给他们尽量多的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斯大林回顾了这段语录之后，马上对恩格斯这种乍看起来似乎过份慎重的态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恩格斯指的是“西方农民”，“能不能说在我们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呢？不，……遗憾的是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还没有打算把我国农民情况和西方农民情况之间的这种差别相当清楚地揭示出来”^⑤。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87页。

② 同上，第381页。

③ 同上，第445页。

④ 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农业生产问题一直是摆在议事日程上进行反复研究的问题，新经济政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之一。

⑤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36页。

斯大林的这段话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理论第一次被公开用来为已经采取的强制决定和强制措施进行辩护。这段话使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把作为革命活动的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辩护的工具。

当时情况是很困难的，富农们（大土地所有者）破坏了计划，他们装满了自己的粮仓并把粮食隐藏起来；他们大造舆论反对集体化。除此之外，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党的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不高，采用了上层所不希望采用的粗暴方法。

惩罚措施对少数剥削者是有效的，但是，对于千百万小农私有者都采取惩罚措施，老布尔什维克就犹豫不决了。当时，斯大林为了排除反对这个方法的人，便开始进行清党：撤销了李可夫接替列宁担任的政府首脑职务，撤销了托姆斯基在共产国际和政治局中的领导职务，数十位在列宁时期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以及成千上万的老布尔什维克都遭到“清洗”。

这次“清洗”后，依靠上边的压力和一系列强制措施，使集体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到九月的三个月中，约有一百万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几乎等于十月革命后的十二年中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数。一九二九年第二季度有二百四十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对富农和怠工者采取的特殊强制措施也被用来对付中农，甚至用在贫农身上。在某些地区，“被没收财产的富农”达到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列宁曾经宣布，建立集体农庄要依靠自愿的原则，由于这一原则遭到破坏而引起了不满，特别是在中农中间。

很多农民确信，他们被迫加入集体农庄时，牲畜将被夺走，于是就把牲畜宰掉了。强制实行集体化的作法变成了一场大灾难：一九二九年苏联有三千四百万匹马，到一九四三年只剩下一千六百万匹，一半多都被宰掉了；牛仅仅剩下百分之四十五，猪剩下三分之一，羊剩下四分之一多一点儿。

农民的愤怒逐渐形成很大的威胁，他们大批大批地离开集体农庄，这就必须迅速修改政策了。由于没有任何人民监督，上面的指示和官僚主义的专横的领导方法所造成的困难消除得非常缓慢，以致在一九五三年终于提出权力下放和实行物质鼓励的问题时，谷物产量和牛羊头数还没有达到一九二八年的水平。

在工业化方面的困难则是另一种情形。

“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①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以这段著名的话对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他强调指出，俄国社会的新结构可以为工业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但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了自己的专政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对彼得大帝的这一段回忆不是偶然的。这段回忆开创了民族主义占上风的时代，而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如果说不是被取消了，也是被掩盖起来了。的确，在斯大林的新的工业化概念中，专制主义的唯意志论取代了列宁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唤起群众的创造性的首创精神。

五年计划头一年的计划投资额达三十四亿卢布，即超过了财政人民委员部批准数目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5页。

的四倍。斯大林强迫全国做出这种物质牺牲以后,认为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到,因此提出了不成比例的指标:一九二八年苏联生产了三百五十万吨铁;按照五年计划的要求,一九三三年则要生产一千万吨铁。斯大林一切都从他号召的五年计划四年甚至三年完成出发,他认为一千万吨铁还不够……一九三二年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生产一千七百万吨。一些党的工作者和专家认为,不考虑现有的条件,要完成既定的任务是不现实的。斯大林则指责这些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搞破坏。实际上,只是到一九四一年苏联才接近斯大林武断地为一九三二年规定的水平。一九三〇年,他要求使铁和煤的生产在下一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后来,他不得不承认在规定的期限内,实际增长率只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

劳动人民没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机会,不仅违背马克思、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且引起经济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由于劳动纪律是上面强加给劳动人民的,所以苏联人民改变了对劳动的态度。除了少数突击手外(虽然他们的创举得到支持和宣扬),基本群众逐渐变成了那种无形而遥远的权力的雇工,因此为了弥补由于群众对经济管理漠不关心而造成的损失,就只好求助于增加镇压和强制措施的劳动立法了。

这个制度的内在逻辑建立在党政机关是万能的、不可违抗的思想基础之上,似乎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事实上则是自上而下地向工人阶级发号施令。这种逻辑必然使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遭到彻底的修正,也就是说,尽管还叫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党取代了阶级,机关取代了党,领导人取代了机关。

斯大林在他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把这种党和国家的概念奉为经典。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①

对于国家,斯大林提出同马克思和列宁完全对立的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假如资本主义势力包围尚未消除,国家甚至在共产主义时期还可能存在^②;第二个论点是,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四至五月中央全会上提出来的,它更加有害。这一论点的内容似乎是: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加强和苏维埃国家进一步发展,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化。

这样的论点完全是来自斯大林关于党和国家的下述概念:如果由一个绝对正确的党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那么一切失败都可以只归咎于阶级敌人所策动的外部阴谋,就是说坚决的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把赫鲁晓夫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材料同揭露斯大林主义后的头几个月公佈的材料和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收集的材料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有一百五十多万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一半)受到监禁,而从一九三六年起有一千多万苏联公民死在监狱里和集中营里。

在战争胜利和为恢复国民经济付出了巨大努力之后,斯大林主义不仅仅在苏联国内造成灾难,而且还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国家里造成了灾难。一九四七年以后,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不仅在苏联被大批消灭,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凡是不盲目照搬苏联“模式”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8页。

② 《斯大林选集》1979年中文版下卷第467页。

者,统统被认为是“客观”修正主义和反革命。

“社会主义唯一“模式”的这种教条化是同列宁的学说根本矛盾的。我们已经说过,列宁曾非常尖锐地强调,一定要弄清楚在十月革命中什么具有普遍意义,什么是俄罗斯所特有的,什么是产生于普遍原理,什么来源于历史。这种教条化使斯大林犯了把别人“革除教门”的错误,从而削弱和分裂了共产主义运动。一九四八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专横的教条主义和主张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领导人被斥为反革命的代理人、间谍、刽子手和法西斯分子。二十年后故伎重演(为了达到同样的要求,使用了更粗暴的办法),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苏联坦克碾碎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探索适合高度发达社会要求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尝试。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比斯大林走的更远。

正是由于二十大把过去的错误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是在极为困难、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方面又取得了辉煌成就的背景中进行分析,它才开辟了新的天地,作出了从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敢于进行的那种自我批评的榜样。

诚然,这种自我批评所采取的方式确实有点儿令人奇怪: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要求兄弟党不得泄露他们听到的东西。这种方式本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因为在一个不可能有任何政治辩论的地方,在四分之一世纪还多一点的时期里,在党内、苏维埃和社会舆论中除了官方的教条别无它物的地方,政治变革只能用爆炸的方式实现,要么象赫鲁晓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出人意料地揭露斯大林一样,要么象若干年后赫鲁晓夫突然淹没在忘川^①一样,两次都不曾征得最高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的同意,又不向苏联公民作任何解释。

尽管批评方式有局限性,但这种批评的良好影响很快就表现出来了:农业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至少是提出来了;完全现实地承认,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以前,农业生产水平既没有达到一九二五年的水平,也没有达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这就实现了整顿的第一个条件——承认现存制度有缺陷。

制度开始自由化,言论和批评有了更广泛的自由,官方承认了物质鼓励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这一切在民主条件下本来是可以提高工业生产水平和刺激创造性的。由于加加林首次完成宇宙航行,苏联在征服宇宙空间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超过了美国,似乎象征着十月革命可能获得第三次光彩,苏联可能实现完全符合新的科技革命要求的决定性转变。

然而,以前那套办法的压力又限制了并且终于破坏这种复兴的可能性。

首先,把对过去的批判降低到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也就是说,是令人可笑地降低了批判的意义。当然,斯大林个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实质上,他个人只是后果,而不是原因。他个人只是集中地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制度。

把“个人崇拜”问题摆到首位,就是巧妙地偷换真正的课题和造成危险的幻想,似乎只要换一个人就可以了,一切都会正常起来。当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功劳在于他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斯大林主义”不是斯大林个人的产物,而是制度

^① 忘川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迷魂汤河,这里比喻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译者注

的必然后果。当时这件事引起了苏联共产党对他的公开指责,苏共宣称:对制度的怀疑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怀疑,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应对“崇拜”负责。然而陶里亚蒂提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而是苏联推行官僚主义的、专横的和中央集权的“模式”问题。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展批判的这种局限性还说明,要尽可能地挽救过去的那一套作法。斯大林的“错误”是作为同他的性格有关的完全偶然的一种现象予以揭露的。揭露他的“错误”之后,曾宣布他的主要理论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基本上还是有效的。这样就把斯大林关于党和国家学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这种学说是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相对立的,是整个斯大林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辩护依据。

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基本原则是教条。根据这种教条,共产党和国家应该领导各种社会活动,从经济生产到文化艺术活动无一例外,同时,还要“从外部”来灌输意识(没有包括另外一个因素——主观革命因素:群众的首创精神,而这是马克思和列宁认为同前者相辅相成的一个因素)。

在一个落后的、被包围的、物质贫困、干部不足的国家里,在某一革命阶段上,对于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这种垄断可能是暂时必要的。这种垄断不可能成为永恒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以这种原则为基础的制度经过一定的时间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僚主义的、专横的和教条主义的变态,导致社会主义的蜕化。

当一切由“上层”统治集团决定,各级党组织除了执行中央指示外(最多不过是中央指示的解释者)不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党也会发生同样的蜕化。

况且,如果“下层”群众得不到任何政治情报,他们怎么能够真正参加讨论工作方针呢?

在党的问题上这种学说的危害性就是如此。因此,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概括他提出的批评时,得出了必须建立“新型党”的结论。于是他本着列宁的精神,重复了列宁的提法,组织形式应适合于每一个国家和每个时代的具体条件。比如说,今天是在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经济和技术发达的国家里,在和平和合法的条件下,共产党就不能采用列宁为那些在不十分发达的、刚刚摆脱半封建和专制制度(不经过资产阶级民主的过度阶段)的国家里还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所确定的完全合乎规律的组织形式。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局限性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赫鲁晓夫的批判没有引起疑问,相反,却使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段得逞了,这是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的结果。在斯大林时期,这种手法是很普遍的:把克服落后状态所必要的手段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也渐渐地混淆起来了。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的口号,更是无稽之谈。首先,靠他说的那套办法根本达不到这一目标。

从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上揭露经济错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严重损失那时起,本应按照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逻辑,进行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

这一改革过程确实也初步形成:开始是把混乱和管理不善作为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的后果加以公开批判;然后,从这一批判中作出实践的结论,开始转向众所周知的权力分散,其原则是“加强”做决议的中央,同时越来越多地信赖地方和个人的主动性(但并非是扩大对劳动人民的信赖,而只是信赖那些“上面”指定的厂长们)。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概念,它是享有更多自主权的积累、核算和管理的中心。

这样一来,过去十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人为之奋斗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计划管理的科学要求同拥有极大主动权的企业自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由于新的科技革命本身所造成的压力,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但在苏联,现今的苏联领导人在这一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

以企业、地方和区域性组织的最大自主权和不断增加个人主动权为前提的经济改革,按其内在的逻辑,还要求(作为条件和结果)不断加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主化,特别是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民主化。

但是,经济改革的要求同政治体制的要求有极大的差别。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官僚主义时曾指出,长官比别人高明和只有那些掌权的人才能有自己的见解的原则,是有意把整个社会利益同国家政权利益混为一谈的官吏们的思想立场,因为他们是这个政权的代表。

把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当作“国家所有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掌握着全部社会劳动剩余价值的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导致严重的变形,正如列宁当年曾经明确指出的那样:导致了为人民建成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自己建成社会主义。

但是,在革命的最初阶段,而且是在特别落后的条件下,为了免于毁灭,而需要尽快地夺取胜利的时候,如果说这样的方法能够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话,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反过来说,用这样的方法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不仅要把劳动人民从统治阶级的剥削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要把他们从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吸引每一个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参加社会活动,则是不可理解的。

若想有效地、顺利地实行这一改革,并改变其同时发生的各种现象,必须有充分的精神自由作为前提,即要有三个基本条件:要有收集和传播情报的自由;要有自由辩论的权利,对提出的意见可以进行批评,此外不得用其它制裁措施进行恐吓;制止任何形式的压制,不管是来自国家政权的强迫命令,还是片面的宣传和群众的“政治说教”所提出的种种虚构。

没有这些条件,既不可能有民主方法,也不可能科学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今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是值得注意的。社会主义已经存在了五十年,新一代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他们来自工人阶级并同这一阶级保持着紧密的团结,按理说,他们是这个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些论调:脑力劳动者应该服从工人阶级。然而,在苏联,脑力劳动者早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这种高谈阔论的目的只不过使知识分子(其实,他们也是工人阶级)服从党的中央机关和它的官僚们。这些官僚自认为是理论上执政的工人阶级意志的绝对正确的代表,而由于这一“先定的谐和”就可以永远不同工人阶级共商大事了。

这种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概念便成为实现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和文化自由的主要障碍。

用经济手段代替行政管理方法,这件事本身无疑是进步的。它要求改变制定生产计划和对劳动人民实行经济刺激的方法。对上面强行规定的东西要加以限制;用企业间的市场交换来替代国家的集中管理,如果不能全部代替,也要代替大部分。而实际上,用一